

战争动员发展史

Evolution of
War Mobilization

张 羽 著



军事科学出版社

战争动员发展史

张羽 著

军事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战争动员发展史/张羽著. - 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4.1

ISBN 7-80137-696-X

I.战… II.张… III.战争动员-发展史-世界
IV.E11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99204 号

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海淀区青龙桥/邮编:100091)

电话:(010)62882626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鑫海达印刷厂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版次:2004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印张:11.625

印次: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278 千字

印数:1-3000 册

书号:ISBN 7-80137-696-X/E·470

定价:19.00 元

目 录

第一章 战争动员的产生	(1)
一、“军事民主制”时代的战争	(2)
二、战争动员产生的主要标志	(5)
三、原始战争动员活动	(9)
第二章 战争动员的发育阶段	(12)
一、临战建军的兵员动员	(13)
二、“取用于民”的装备物资动员	(18)
三、以奴隶为主的战时勤务保障动员	(22)
四、短期战争与初始性动员	(24)
五、早期的战争动员方法	(26)
第三章 战争动员的初步定型	(30)
一、从初始性动员到消耗性动员	(31)
二、从“业余军队”到动员型武装力量	(34)
三、从有产者到无产者的兵役动员改革	(38)
四、从“取用于民到取用于国”	(42)
五、交通运输动员的作用逐步显示出来	(46)
第四章 战争动员在封建社会中后期的发展	(49)
一、商品经济为战争动员开辟了新天地	(50)
二、中央集权统治与战争动员	(55)
三、火器的生产制造与战争动员	(59)
第五章 法国大革命与全民总动员	(63)
一、《全国总动员法令》的出台	(64)
二、全民总动员的作用及意义	(69)

第六章 普遍义务兵役制与拿破仑战争	(74)
一、资产阶级革命性质的普遍义务兵役制	(75)
二、普鲁士的速成兵制度和新型的后备军	(80)
三、克劳塞维茨的战争动员思想	(89)
第七章 美国内战与工业动员	(92)
一、战争对工业动员产生了依赖关系	(93)
二、大机器生产与兵员动员的需求	(95)
三、以战时军品生产为主的经济动员	(98)
四、从“军队主管”到“政府主管”	(102)
第八章 1870 年的普法战争与普鲁士的动员	(105)
一、普鲁士的战争动员准备	(106)
二、普鲁士把动员变为战争艺术	(112)
三、普鲁士动员实践对世界的影响	(117)
四、新旧动员制度的碰撞	(122)
第九章 日俄战争动员	(127)
一、垄断经济与战争动员	(128)
二、动员制度落后是致命的落后	(132)
三、动员决策失误是重大的失误	(135)
四、对帝国主义时代战争动员的认识	(139)
第十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争动员	(142)
一、为“大战”进行的动员准备	(142)
二、动员计划与“预备动员期”	(146)
三、动员从宣战前开始了	(148)
四、持久战迫使工业再动员	(153)
五、工业动员迫使国家总动员	(157)
六、总动员迫使政府唱主角	(162)
七、“主角”的拿手好戏是统制	(167)

第十一章 列宁领导下的“战时共产主义”	(174)
一、从粮食垄断专卖到余粮收集制	(175)
二、私人商业国有化和实物配给制	(178)
三、大型私有企业强制收归国有	(179)
四、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	(180)
五、高度集权的战时组织	(181)
第十二章 两次世界大战间的战争动员	(187)
一、进入国家战略的战争动员	(187)
二、未来的战争动员什么样	(193)
三、武器的破坏力与反动员	(198)
四、构建武装力量动员基础	(202)
五、殊途同归的经济动员准备	(207)
六、日本人走在了亚洲的前面	(212)
第十三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战争动员	(220)
一、为闪击战编写的战前动员“教程”	(221)
二、坐等“动员预备期”的恶果	(225)
三、苏联以土地换动员时间	(228)
四、转入战时状态的国家组织体制	(231)
五、国民经济从局部动员到总动员的转换	(242)
六、全民性防护动员成为战争动员的新任务	(250)
七、科技动员显示出前所未有的作用	(257)
八、新的战争速度与交通运输动员	(262)
九、中国国民党政府的抗日战争动员	(265)
十、毛泽东战争动员思想	(272)
第十四章 工业时代战争动员的困惑	(277)
一、供不应求的困惑	(278)
二、捉襟见肘的困惑	(279)
三、保军与保民的困惑	(283)

四、平战兼顾的困惑·····	(286)
第十五章 冷战中的全面战争动员体制·····	(289)
一、战后初期的工业动员基础建设·····	(289)
二、核弹险些葬送了战争动员的前程·····	(294)
三、长期处于临战状态的战争动员准备·····	(296)
四、20 世纪 60~70 年代中国的战争动员准备·····	(304)
第十六章 逐步转向局部战争的动员·····	(308)
一、美军在越战中的“添油式”动员·····	(308)
二、苏军在阿富汗战争中的“一次性”动员·····	(311)
三、中东战争动员的意义·····	(313)
四、相对和平时期的战争动员准备之路·····	(320)
第十七章 冷战结束后的战争动员·····	(324)
一、小战大动员的海湾战争·····	(324)
二、为高技术局部战争动员而准备着·····	(328)
三、科索沃——美国式动员的实验场·····	(334)
四、高技术武器的破坏力与反动员·····	(338)
第十八章 走进 21 世纪的战争动员·····	(343)
一、美国式动员会不断重演·····	(343)
二、人民战争没有过时·····	(344)
三、战争动员的战略地位不会改变·····	(348)
四、伊拉克战争动员备忘录·····	(354)

第一章 战争动员的产生

关于战争动员的产生，迄今为止，中外军事理论界的说法是不确定、不统一的。有的学者十分肯定地认为，战争动员产生于早期的奴隶制国家——古巴比伦王国的汉谟拉比时代。理由是，汉谟拉比的武装力量有了常备与后备之分。显然，这个理由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就战争动员的产生而言，武装力量有无常备与后备之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类的战争活动中何时出现了为获取或者增强战争力量，而把战争潜力转变为战争实力的活动。有的学者虽然已经认识到“有了战争就有了战争动员”，但却没能作出进一步的论证。有的学者则进一步提出，早在原始社会末期的“军事民主制”时代就出现了战争动员性质的活动，但却不能肯定战争动员就产生于这一时代。原因是他们没有从那段缺少文字记载的人类历史中找到足够的证据，或者没有找到衡量战争动员产生与否的尺度。还有的学者以人类是否使用了“动员”这一术语为要件，来评判“真正意义”上的战争动员，得出了“真正意义的战争动员产生于法国大革命之后”的结论，言外之意，古代社会根本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战争动员”。这无疑是在犯了形而上学的错误。

由学术界造成的这种复杂局面，使人们在谈论战争动员的时候尽量绕开其产生问题，实在绕不开，就大而化之地讲“古代社会就出现了战争动员活动”。上述情况的存在，说明对战争动员产生问题进行深入探讨是非常必要的。同时也说明，弄

战时动员体制的发展与完善

哲学史》一书的作者告诉我们，在原始社会末期的军事民主制产生以前，虽然氏族部落之间也存在着流血的暴力冲突，但这种暴力冲突“可能以部落的消灭而告终，但决不能以它的被奴役而告终”。^① 因此，“在原始社会的早期和中期，具体来说，在人类社会的旧石器时代中期以前是不存在马克思主义概念意义上战争的”。但是，至原始社会末期，在人类完成了两次社会大分工并产生了私有制和阶级之后，“带有掠夺性的战争，不仅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完全可能的。它的产生就是必然的了”。^② 正因为如此，恩格斯才把原始社会末期出现的社会管理制度称之为“军事民主制”，认为“其所以称为军事民主制，是因为战争以及进行战争的组织现在已经成为民族生活的正常职能。邻人的财富刺激了各民族的贪欲，在这些民族里，获取财富已成为最重要的生活目的之一。他们是野蛮人：进行掠夺在他们看来是比进行创造的劳动更容易甚至更荣誉的事情”。^③

由于原始社会是人类社会必经的发展阶段，因此，马克思主义概念上的战争，即以私有制和阶级的出现为前提、以掠夺和奴役其他氏族部落为目的战争，在各个氏族部落进入原始社会末期的军事民主制时代都曾发生过。中国历史上的尧、舜、禹，实际上就是原始社会末期军事民主制产生的氏族部落的首领。他们都曾率领本部族对邻近部落进行掠夺性战争，在把其他部落的财富据为己有的同时，也把大量的战俘变成了供本部

① 《马克思主义军事哲学史》，军事科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71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第 2 卷，战士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415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军事文选》，军事科学出版社 1977 年版，第 254 页。

落人驱使的奴隶。公元前 1400 年前后，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印度，在其北部地区爆发了大规模的“摩诃婆罗多战争”，失败的俱卢族落得了被奴役、被驱使的境地。

历史上还有这样的情况，处于原始社会末期军事民主制时代的氏族部落，打败了先期进入奴隶制社会的国家，并对其文化进行了毁灭性的破坏，对其财产进行了疯狂的掠夺，对其人民进行残酷的奴役，从而使其又退回到原始社会末期的军事民主制时代。古希腊南部的迈锡尼地区早在公元前 2000 年就出现了国家的曙光。但在公元前 11 世纪至公元前 9 世纪，却因为尚处在原始社会末期的“野蛮人”的入侵，又回到原始社会末期的军事民主制时代。而退回到原始社会末期军事民主制时代的迈锡尼，又对其他部落和城邦发动了一次又一次以掠夺其财产和奴役其人民为目的的战争。从同时代的盲人诗人——荷马的作品中可以找到有关这类战争的记录。正如恩格斯所说：“在荷马的诗中，我们可以看到希腊的各部落在大多数场合已联合成为一些小民族；在这种小民族内部，氏族、胞族和部落仍然完全保持着它们的野性。它们已经住在有城墙的城市里；人口的数目，随着畜群的增加、农业的扩展以及手工业的萌芽而日益增长；与此同时，就产生了财产上的差别，随之也就在古代自然长成的民主制内部产生贵族分子。各个小民族，为了占有最好的土地，也为了掠夺战利品，进行着不断的战争；以俘虏充作奴隶，已成为公认的制度。”^①

如果荷马史诗还值得怀疑的话，那么直到公元 376 ~ 568 年仍处于原始社会末期军事民主制时代的日耳曼民族的所作所为，则足以使我们认清，什么是原始社会末期的军事民主制以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1 卷，战士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119 ~ 120 页。

及在这个制度下出现的真正意义上的战争。据《德意志军事思想研究》一书的作者所述，公元前1世纪中叶，日耳曼人开始在莱茵河和奥得河之间的广大地区定居下来，经营农业，过着氏族制度和公有土地制度的生活，并在大多数日耳曼部落形成了军事民主制。处于原始社会末期军事民主制时代的日耳曼人，频繁地对罗马帝国发动战争，经亚得里亚堡之战（公元378年）、卡塔洛温平原之战（公元451年）、苏瓦松之战（公元486年）等一系列较大的战役后，日耳曼各部族在军事首领的率领下像潮水一样举族涌入罗马帝国。到此，靠军事民主制维系的日耳曼人走完了200余年民族迁徙的漫漫长路，一跃而进入封建社会。

可见，原始社会末期的军事民主制时代存在着真正意义上的战争，而正是因为这一时代有了这样的战争，才使战争动员在这一时代产生成为可能。

二、战争动员产生的主要标志

原始社会末期存在着真正意义上的战争，仅仅说明了这一时代具备了战争动员产生的可能。但是，要证明“有了战争就有了战争动员”，还有一件事要做，那就是要对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的情况，特别是这一时期的战争活动进行分析，看其是否具备了战争动员产生的客观必然性，进而在当时的战争中出现了战争动员性质的活动。惟有如此，我们才能最终证明，战争动员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的军事民主制时代。

从有关文献和理论著述中可以看到，处在原始社会末期军事民主制时代的各个氏族部落，都有一支“居民自动的武装组织”。这支“居民自动的武装组织”是由部落的成年男子组成

的“业余军队”。他们平时耕牧，每当遇有战事，便自带武器和给养参加战斗。很显然，作为“业余军队”，“居民自动的武装组织”平时是以非武装的形式即以战争潜力的状态存在的，而且是这个氏族部落主要的战争潜力。他的每一个成员平时是“民”而不是兵，整个部落尚处在和平状态。然而，当一个氏族部落的成年男子都放下手中的活计，拿起武器赶去参加战斗的时候，这个部落也就把它主要的战争潜力转变为战争实力了，他们当中的每一个成员也就完成了由“民”到“兵”的转变，整个部落也就由和平状态转入了战争状态。这种由“民”到“兵”、由平时状态到战争状态的转变，已经使我们捕捉到了战争动员活动的影子。

然而，如果这种转变是在无意识、无组织的状态下完成的。那么，我们也只能认为此时的战争动员活动仅仅具备了战争动员的某些属性，还不是完整意义上的战争动员。因为，早在军事民主制产生之前，就已经存在着“居民自动的武装组织”，他们自发地组成非职业的武装团体，遇有战事便按照事先的约定参加战斗。但是，通过进一步研究我们发现，军事民主制时期所发生的平战状态转变，与此前发生的平战状态转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点，这个不同点就是：它不是自动完成的，而是人们有意识、有组织的行为和结果。

从思想方面看，由于以奴役和掠夺为目的战争，不仅频繁发生，而且其残酷性使每个部落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这就促使人们对战争的方法、战争的制胜因素，特别是对如何获取或增强武装力量的问题有了更多的思考。描写公元前1000年率领雅利安人向南印度扩张的英雄罗摩的史诗——《罗摩衍那》中，就借罗摩之口提出：同敌人在适当时候讲和，同敌人在适当时机宣战；使自己方面兴隆茂盛，能够得到长治久安。弱于敌人或力量相等，国王应同敌人讲和；弱于敌人不要藐视

他，而是同他战斗相搏。史诗中还提到，如果能够看到5种因素——行动开始时的手段和措施、人力、决定的地点和时间、阻止困难的产生、成功，战斗中就不致失利。虽然从这些有限的文字中，我们没有得到当时的人们对调动战争潜力、实现平战状态转换以应付战争的直接知识，但字里行间仍然向我们透露出：战争的胜负取决于自身的战争潜力及其运用，特别是“行动开始时的手段和措施”——在恰当的地点和时间，集中必需的参战人力成为取胜的关键。而在人口有限、生产力低下的原始社会末期，对于仅有民军的原始部落或部落联盟而言，为了应付战争，其“行动开始时的手段和措施”，最重要的莫过于进行将居民变为战士、将战争潜力变为战争实力、将部落从平时状态转变战争状态的战争动员活动。非此则不足以应付战争，就要落得被掠夺、被奴役的地步。据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原始社会末期的战争出现的战争动员活动，不是像有些学者所说，只是一种“王者”的随意行为，而是有意识、有目的的行为。这一点，既是战争动员活动产生的必要条件，也是战争动员活动产生的重要标志之一。

从组织方面看，假如上述转变确如很多人所说只是一种事先约定好的、居民自动的行为，根本没有也不需要什么人或组织在中间做一些领导和发动的工作，那么，尽管在这些转变的过程中，已经存在着战争动员性质的活动，但仍不能据此就认为，在“军事民主制”时期的战争活动中，战争动员就已经产生了。原因很简单，战争动员活动若没有组织者和领导者，即缺少行为主体，就成了动员客体自发的行为，具体到这一时期而言，就成了居民自己动员自己，那就太可笑了。然而，实际情况却是，原始社会末期的战争早已不是随机性的行为，也不是居民武装自发的行为，而是有组织、有领导的行为。这个行为的主体便是由军事民主制产生的氏族“军事首长”和能够对

部落的战争与和平做出决定的某种“权力机关”。

位于古代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是世界上最早产生城市国家的地区之一。在从氏族解体到国家形成的过程中，苏美尔人实行的也是军事民主制。当时，氏族部落的管理机构是由“三个协调权力的机关”，即“人民大会、氏族首长议事会和企图获得真正王权的军事首长”组成的。部落军事首长是“不可缺少的常设公职人员”。军事民主制产生之初，有关战争与和平、部落军事首领的人选等重大问题，都是由“三个协调的权力机关”来决定的。“战争爆发时，公民大会规定应征人数；只有在极端紧急的情况下才实行全民武装。每年由人民选举将军十人负责征召和建立这些部队”。^① 到军事民主制后期，随着部落间战争的日益频繁，军事首长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军事首领开始排斥人民大会和酋长会议的作用，使自己的职位由选举产生逐渐变为从特定的家族中选出，其权力也越来越大，成为决定战争与和平的主要人物。尽管此时“人民大会、氏族首长议事会和军事首长”之间已经不够协调了，但“三个不太协调的权力机关”，尤其是已经取得特殊地位的军事首长，无疑是战争的发动者和组织者，因而也是将部落的居民变为战士、将部落的战争潜力变为战争实力、将整个部落从平时状态转变到战争状态的行为主体。

以部落的“权力机关”和军事首长为动员的组织者，以部落的成年男子以及他们个人拥有的武器为动员对象，以迅速完成前述提到的“三个转变”为内容的战争动员活动，就这样在原始社会末期的军事民主制时代产生了。

^①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 1977 年版，第 90 页。

三、原始战争动员活动

从极为有限的史料中，我们仍然可以描述出军事民主制时代处于原始状态的战争动员的大致轮廓。

平时，各个氏族部落为随时发生的战争而时刻准备着。对于一个军事民主制的部落以及他的组成单位而言，由于战争已经成为他们的一种职能，它们必须使自己“首先是一个军事单位，其次才是一个经济单位”。为此，他们很早就建立了“分区出兵”的动员体制，平时就按照血缘关系和居住地域的远近，把部落的成员编组起来。日耳曼部落中最强大的最好战的苏维汇人，他们分成 100 个区，每个区每年派 1000 人轮流当兵，称为千人团。有的小部落则组成百人团。他们除拥有一支可作为军事骨干使用的扈从队之外，还要求每个成年男子既是生产者也是战斗员。为了缩短成年男子从“民”到“兵”的距离，日耳曼部落采取的办法是，“当一个人到达能使用兵器的年龄，就在大会上由一位酋长或本人的父亲或亲属给这个青年装备一面盾和一支矛”，要求“他们无论在办理公事或私事时，兵器总不离手”。除公共发放的武器之外，每个成年男子还要按规定准备好自己所应具备的其他武器装备。除一些可用的生产工具外，他们还要刻意打磨制作一些专门用于战斗的武器。结婚也成了日耳曼人获取武器装备的重要途径。男方在向女方家庭送交的彩礼中至少要有“一面盾、一支矛或一把剑”，而女方也要“带来一些盔甲之类的送给自己的丈夫”。部落的头领们要经常组织本部落的成年男子“举行格斗和军事表演”，并通过狩猎、游牧等生产活动对他们进行战斗训练。他们还事先约定，以烽火狼烟或高处立帜为号，所有成年男子看到这样的信号，必须迅速拿起武器赶到指定的集结地点。这个指定的

集结地点，可能是打谷场、经常召开公民大会的地方、城门外或城外的某个高地。

每当遇有战事，各个部落会像公元前8世纪的古希腊城邦国家雅典那样，其“公共权力”机关——氏族大会便立即召开会议，决定是与之战，还是与之和，是动员还是不动员。一旦决定与之战，部落首领便会立即以烽火狼烟、高处树旗等方式发出动员信号。所有的成年男子看到这个信号后，便迅速自带武器、食品赶到部落经常聚会的地点或其他约定的地点。在这里，他们将把少量的扈从队员作为军事骨干与其他更多的成年男子编组在一起，各“区”的负责人还要“检查从军者是否按规定携带自备的装备”，并向氏族部落的头领们做出报告。如果时间允许的话，他们要举行牺牲祭神仪式，借神灵之口讲明战争意义，进行思想发动。然后，在军事首领的带领下奔赴战场。当然，不是所有的原始部落都会像古希腊人那样，把战时动员组织的如此严密，有的部落也会像恩格斯在论述军队演变的文章中描述的易洛魁人那样，“要是发生战争，大半都由志愿兵来进行。……反对这种敌人的军事行动，多半由一些优秀的战士来组织；这些战士发起一个战争舞蹈，凡参加舞蹈的人，就等于宣告加入了出征队，队伍便立刻组织起来，即时出动。”^①

战争通常会演变为全部落所有成员的总动员，不分男女老幼齐上阵。甚至仅此还不足以应付战争，同血缘的部落之间乃至不同血缘的部落之间往往结成联盟，靠联盟的力量来消除战争的危险。荷马史诗中描述的就是希腊半岛各部落，是如何联合起来远征特洛伊城的。在《史记》中记载的涿鹿之战中，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107页。